

杨宇（2008）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性格与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sup>1</sup> (卷首语)

杨宇<sup>2</sup>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终于完成了。这一辑的主题定为“性格与文化”，与第一辑“自我与文化”、第二辑“面子与文化”，和第三辑“组织行为与文化”一脉相承。我们保留了对文化研究的一贯关注和汇集经典文章的传统，同时，在这一辑《评论》的编辑工作中，我们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第一，增加了为本刊原创论文的篇数，试图搭建一个更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第二，增加了反映国内国际学术前沿的文章篇数，试图聚焦该领域的热点与难点。第三，更加重视各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该领域学术进展的背景和脉络。

尽管如此，需要读者特别留意，这一辑《评论》所刊选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代表在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里最有“分量”的文章。近一二十年来，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国际重新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热点，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出现，许多真正有分量、甚至已经有历史地位的研究在学术界内外也已经被广为了解。我们想，与其出版一本重心在“总结过去”的论文集，不如出版一本更加“展望未来”的论文集。我们依然重视介绍特定领域内的经典研究，同时，我们希望在这一辑《评论》的卷首语中尝试勾勒出一个基于过去、面向未来的框架，把随后所刊选的文章仅仅当作相关例子和窗口来看待，这样的组织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动我们对一个研究领域的深刻理解，和更有创造性地开展新的研究工作。

这里，让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一辑《评论》选题的用意。性格与文化的研究传统上一直都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课题，经历过若干年心理学分支学科间的学术争论，人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越走越近（Swann & Seyle, 2005）。原因之一，是因为跨学科的研究在学术界被广为接受。原因之二，是因为追本溯源，专注于性格的人格心理学与专注于情境的社会心理学，本来就对行为以及其他心理因素有互补的解释功能。原因之三，则是因为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都意识到，人格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人的认知、情感、动机，与行为特征等分析层面，与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人际、群体、群际、社会、文化与历史等分析层面相互影响，互可借鉴。因此，我们还希望这一辑《评论》能够进一步促进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这篇卷首语的第一节，我将简要回顾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由于这一类研究与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两个分支学科密切相关，在文章的第二、三节，我将分

---

<sup>1</sup> 杨宜音为本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sup>2</sup>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系（Email: [yuy@ceibs.edu](mailto:yuy@ceibs.edu)）。

别讨论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路线，包括它们在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冲突以及解决方案。在第四、五、六节，我将简述进行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思路。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我再讨论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以及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拓展我们对整个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和能够更有效地从这一辑《评论》随后所遴选的文章中获益。

## 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

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始于我们对他人的好奇。作为个体，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兴趣与生俱来，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文化中生活的相对类似的人，我们也永远都会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或者在其他文化中生活的相对不同的人充满好奇。我们与他们在性格上究竟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同或不同？这些相同或不同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我们应该如何与其他文化来的人相处？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可以为相关门类的科学研究提供依据，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问题，也恰恰就是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主题。

在早期的中国学术史上，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在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1939）、《乡土中国》（1948）、许烺光的《中国人与美国人》（1953），以及比较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差异的《宗族，种姓，俱乐部》（1963）等书中，都对当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性格有过深刻的描述，也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除了这些学术研究，其他一些作品比如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35）等，也同样包含了不少对上世纪早期中国人性格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

在西方学术史上，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同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在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有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参与了“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是 Ruth Benedict 描绘日本人国民性格的《菊花与军刀》（1946），以及 Geoffrey Gorer 和 John Rickman 的《大苏俄人民》（1949）。根据 LeVine（2001）最近的回忆，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国民性格的研究式微，跟《大苏俄人民》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令人不满的观点有极大的关系。除了单纯的学术争论以外，Benedict、Gorer、Rickman，以及 Margaret Mead 等从事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知名人类学家曾经受到美国军方资助，研究成果为冷战策略提供参考，也引起众多人类学家争议。最重要的是，当时这几位人类学家并没有亲身到日本和苏俄等地进行人类学研究惯常的田野调查，只是依赖于流落到美国的外国难民所提供的访谈资料，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因此为人诟病。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主要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以及其他民间人士完成，以描述性的工作为主。旨在通过科学手段尤其是实证主义手段来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心理学家，并没有介入到性格与文化的研究中来。在心理学内部，同性格与文化研究关联最密切的有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两个分支，而这两个分支在上世纪上半叶，不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实证资料的积累上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在下两节中，我们分别来看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 人格心理学的历程：特质论与社会认知论

人格心理学（或性格心理学）最早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手段了解人与人在性格上有何相同或不同。人的性格就像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一样，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方式来了解与掌握，假如我们没有今天的学术积累，一起回到百余年前，应该怎样开展关于性格的系统研究呢？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应当是找到一个大家互相承认的、描述性格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不同研究者进行的不同的工作才能够在一个主题下不断积累和深入。

1884年，曾经对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统计学、地理学等许多领域都有贡献的 Francis Galton 在一篇探讨如何测量性格的文章里提到，我们可以从字典里找寻用来表述人性格的词汇，然后通过这些词汇来找寻进行性格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后来，这样一个简单却天才的想法演变成了著名的词汇学假说（lexical hypothesis）：人与人在性格上的差别一定会凝聚在人使用的语言当中，此外，一个差别越重要，人就越有可能发展出更简单的词汇以更经济地来表达这个差别。虽然用来描述性格的方式可能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任何一门语言里所包含的词汇却一定是有限的——它们全部都在一部字典里，而字典里用来描述性格的词汇更一定是有限的，有了这个有限的范围，我们就可以发展出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发展出来的各种研究，我们可以通称为性格的特质论（trait approach）。

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几位著名心理学家开始从字典里找寻可以描述性格的词汇，然后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这些词汇归纳到若干个主要因素上，再根据这些因素制定各种量表来测量人的性格，最后运用到临床和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去。比如，Allport 和 Odbert（1936）首先从当时两部最大的英语字典中一共找到了近 1 万 8 千个可以将人的行为区分开来的词汇，又把过于隐晦的和其它不大适合的词汇去掉，将它们缩减到 4 千 5 百个与性格有关的词汇，主要包括象“外向的”、“友好的”、“诚实的”等形容词，称之为特质（traits）。随后，Cattell 和他的同事们则从 40 年代开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将这 4 千 5 百个词汇，再归纳到 35 个基本因素上，最后制定出心理学界一直到今天都在使用的 16PF 性格量表（Cattell, Eber, & Tatsuoka, 1970）。这一段特质论发展的历史，有两篇文章做过详细的记载（John, 1990; John & Srivastava, 1999）。

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

1968 年，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青年人格心理学家 Walter Mischel 出版了一本震惊学界的书《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在这本书里，Mischel 回顾了大量和性格有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时基于特质论发展出来的各种性格量表描述性格的能力虽然尚可接受，预测行为的能力却非常低下。“外向的”、“友好的”，以及“诚实的”等特质企图描述的是人的一些比较稳定的性格特征，然而人的行为却常常随着当下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很难被特质准确地预测。

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只是在抨击当时急需改进的性格量表，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却动摇了人格心理学存在的根本。倘若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测量工具对心理学最关注的对象“行为”的预测力不强，除非这些理论和工具能够尽快得到修改，否则人格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 Mischel 本人主张的是对理论和工具的改良，可是这本书所带来的纷争，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都加入到了一场“性格与情境之争（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的学术争论中来。虽然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在原则上认同社会心理学之父 Kurt Lewin 在 1936 年表达过的一个观点，即人的行为由人的性

格 (person) 和人所处的情境 (situation) 共同决定。可是, 在“性格与情境之争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里, 大家仍然为到底是人的性格更重要还是人所处的情境更重要争论不休。这一段历史的细节, 在晚近许多文献当中都有记载 (Funder, 1999, 2001; Funder & Colvin, 1991; Kenrick & Funder, 1988; Roberts & Pomerantz, 2004; Ross & Nisbett, 1991; Swann & Seyle, 2005)。这里, 我们只考虑几个最主要的问题。

首先, 性格与情境谁更重要本质上就是一个假问题。在实证研究当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性格与情境两类变量究竟是如何测量的, 不同的测量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答案。其次, 就算性格确实不能足够有力地预测人的行为, 这个结论本身也不能说明情境就是能够预测行为的更有力因素。实际上, 如果把一些社会心理学经典研究中情境的因素做一个综合的计算, 我们会发现情境因素对行为的预测能力与性格因素不相上下 (Funder & Ozer, 1983)。因此, 性格与情境谁更重要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性格与情境究竟是 *如何* 决定行为的。最后, “性格与情境之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 我们会发现, 在发展心理学 (Ceci & Williams, 1999)、组织行为学 (Davis-Blake & Pfeffer, 1989; House, Shane, & Herold, 1996)、行为遗传学 (Moffitt, Caspi, & Rutter, 2005)、态度的研究 (Schwarz, 2000)、领导力的研究 (Vroom & Jago, 2007) 等等领域从过去到现在, 它的身影无处不在。Thomas Kuhn (1962) 曾经揭示过非科学因素在科学发展过程的影响, 在这一场性格与情境之争的背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术争论对相应学科资源的影响。同时, 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 David Funder 最近还谈到, 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与性格与情境之争类似的争论想必在未来也不会停息 (Funder, 2006)。

让我们再回到人格心理学内部, 面对性格与情境之争, 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 经过进一步的改良, 特质论的地位可以被稳固地保留下来。到了今天, 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 改进后的各种特质论量表的确可以预测在个体、个体之间, 以及社会水平上的许多重要心理活动与行为 (Ozer & Benet-Martínez, 2006)。人格心理学家经过多年的一再努力, 基本上确认了人对性格的描述通过因素分析的手段可以归纳到外向性 (Extraversion)、随和性 (Agreeableness)、责任感 (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 (Neuroticism), 以及开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五个主要的因素上来 (e.g., Digman, 1990; Goldberg, 1981, 1993; McCrae & Costa, 1985, 1999), 这五个主要因素一般简称为“大五”。当然, “大五”是否真正稳定, 比如在英语以外的语言当中, 是否还存在同样的五个主要因素, 以及是否需要修改因素的个数和含义等等, 都是学术界仍在不断探讨和完善的问题 (e.g., Ashton, Lee, Perugini, Szarota, De Vries, Di Blas, Boies, & De Raad, 2004; Wang, Cui, & Zhou, 2005)。

另一方面, 当年掀起巨大波澜的 Mischel 以及其他心理学家, 又逐渐发展出一套称之为性格的社会认知论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 学说 (e.g., Bandura, 2001; Cantor, 1990; Cervone, & Shoda, 1999; Dweck, 1996; Read & Miller, 1989)。到了今天, Mischel 仍然坚持并发展了他当年的观点, 那就是人的行为常常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很难被稳定的特质准确地预测, 因此, 我们对性格的把握, 应该从“如果 (情境) 那么 (行为)”的角度来看。比方说, 说一个人比较内向并不一定是对这个人性格的准确描述, 这个人在面对同事时比较内向, 面对家人时比较外向才是对这个人性格的更准确的描述。此外, 介于情境与行为之间, 应该有一套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 (cognitive-affective units, CAUs) 来调控, 它们可以用来具体解释某个人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境中会产生特定的行为, 一般而言, 这些认知情感单元又包括人对情境的理解、

目标、期待，以及人的价值观、能力等等内容（Mischel, 2004; Mischel & Shoda, 1995; 1998; Mischel, Shoda, & Mendoza-Denton, 2002; Shoda & Mischel, 1993, 1998）。

性格的特质论与社会认知论是今天的人格心理学里最重要的两套学说。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特质论在人格心理学里有一段较长的发展历程，基于特质论的实证研究因此数量更多，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统一。相比较而言，社会认知论在人格心理学里的发展历程较短，实证研究的积累相对较少，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第二，特质论主要用来把握特质的主效应和人在具体特质上的个体差异，而社会认知论主要用来把握在个体水平上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和个体内的变异。第三，特质论本质上还是一套描述性的学说，而社会认知论由于强调认知情感单元等中介机制，它的解释功能更强大。

### 文化心理学的历程：维度论与动态建构论

虽然年代与背景都非常不同，文化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在发展历程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认为，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内部的独立分支大约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标志是一群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共同推动了《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这本学术杂志的出版。刚开始的时候，文化心理学的目的也是在于通过科学的手段了解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有何相同或不同，因此，跟人格心理学一样，也必须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单元，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不同的研究者才能相互交流，不同的研究也才能在一个主题下不断积累和深入下去。

1980 年，荷兰社会心理学家 Geert Hofstede 出版了一本叫做《Culture's Consequences》的书。在这本书里，Hofstede 整理了 IBM 公司对自己全球几十个国家员工工作价值观的调查，提出这些国家（或者文化）在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男性特质（masculinity）四个主要维度上有所不同。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得到了最多的注意。通常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个体主义倾向较为明显，而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集体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后来，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在自我的领域里，又被 Markus 和 Kitayama（1991）引申出相互依存与相互独立的自我构念（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s），通常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相互独立的自我构念较为明显，而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相互依存的自我构念较为明显。从上世纪 70 年来以来，许多文化心理学家又提出了更多其他有价值的维度（e.g., complexity, Chick, 1997; high-low context, Hall, 1976; traditional versus secular-rational values, and survival versus self-expression values, Inglehart & Norris, 2003; social axioms, Leung & Bond, 2004; tightness, Pelto, 1968; Triandis, 1994, 1995; conservatism, hierarchy, mastery, autonomy, egalitarian commitment, and harmony, Schwartz, 1992, 1994）。这些维度，都被用来区分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有何相同或不同，虽然各个维度的内涵并不类似，我们可以把它们通称为维度论（dimensional approach）的学说。到这里，本来也没有问题。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对维度论尤其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备受关注的维度发出质疑的声音逐渐升高。比如，1999 年，Takano 和 Osaka 两位日本学者回顾了 15 项对比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美国人并不比日本人更倾向于个体主义，日本人也更不比美国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同年，Matsumoto（1999）回顾了其他一些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日本人在自我构念上并不显得比美国人更加相互依存，美国人也并不比日本人显得更加相互独立。到了 2002 年，Oyserman, Coon, 和 Kimmelmeier 用元分析 (meta-analysis) 的办法，回顾了大量关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这个维度并不能算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些研究，在文化心理学和相关领域当中激发出巨大的反响，到了这里，怎么办？

与人格心理学面对困境的解决方案相似，一方面，维度论的地位仍然可以被稳固地保留下来。比如，Schimmack, Oishi, 和 Diener (2005) 重新分析了 Oyserman 等人的数据，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住不同文化中的人回答问卷时的特定风格，他们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当中，Kitayama 等人也发现，虽然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上的得分均值差异并不明显，但是美国人与日本人在这些量表上的分布差异却非常明显，美国人分数的分布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维度上比较均匀，而日本人分数的分布在这个维度上仍然倾向于集体主义。

另一方面，康莹仪、赵志裕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发展出一套称之为文化的动态建构论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学说，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天地大大拓宽。根据动态建构论的观点 (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ínez, 2000)，文化并不是维度论定义的静止的、宽泛的构念，它更加动态、不连续，是一套为人共享并内在化了的松散网络，而这些松散结构，又由随着不同情境而变化的知识结构所组成。因此，先前文化心理学所假设的不同文化在种种维度上的差异，会随着具体情境所蕴含的文化含义而增强、消失，甚至是逆反。这一套学说，虽然发展的时间不长，已经有相当有力的实验证据支持。

文化的维度论与动态建构论也是今天的文化心理学里最重要的两套学说。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我们同样会发现它们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维度论在文化心理学里的发展历程略长，基于维度论的实证研究因此数量更多，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统一。相比较而言，动态建构论在文化心理学里的发展历程较短，实证研究的积累相对较少，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第二，维度论主要用来把握特定维度的主效应和不同文化在这些维度上的差异，而动态建构论主要用来把握在文化水平上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和文化内的变异。第三，维度论本身只是描述性的学说，而动态建构论因为强调机制，它的解释功能更强大。

到这里，我们已经简要回顾了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各自的发展历程、主要冲突，以及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三节里，我们为深入理解性格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抽象出三种不同的思路，它们分别是特质论与维度论、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和本土心理学三种思路，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对性格与文化的研究有更宏观的认识，也更有可能开拓出崭新的研究方向。

## 思路之一：特质论与维度论

从前两节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人格心理学的特质论和文化心理学的维度论这两套学说的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比如，它们在各自的学科分支当中有类似的学术传统，发展的时间相对较长，积累了相对较多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相对统一。此外，它们本身也都是描述性的学说。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具体特质或者维度上的主效应，以及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具体特质或者维度上的差异。显然，

特质论与维度论最主要的差异，则在于特质论集中在个体水平上，而维度论集中在文化、国家，和社会的水平上。

除了在这些特征上的相似之处，我们还可以把特质论与维度论抽象到另外一个层次来比较。我们曾经提到，早在 1936 年，社会心理学之父 Kurt Lewin 就主张“任何一个心理事件都同时取决于人当时的状态，以及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候两者的重要性有所不同”（第 12 页）。这一段论述，也常常被简化成一个公式来表达： $B = f(P, S)$ ，其中的  $B$  代表行为， $P$  代表人的性格， $S$  代表情境，而  $f$  则代表性格与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公式在心理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都被视作一个基本的法则，多年以来，人格心理学被看作关于  $P$  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被看作关于  $S$  的研究，在“性格与情境之争”发生过以后，大家都认为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揭开  $B$  的谜底。

这里，我们可以把上边的公式稍微作些转换，如果  $B = f(P, S)$ ，那么  $P = f(S, B)$ ，换句话说，人的性格也可以由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决定。在特质论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大五等主要特质，在维度论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主要维度。不论是特质还是维度，两者都是在  $P = f(S, B)$  这个公式左边直接关于  $P$  的研究，只不过一个集中在个体水平上，另一个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这一类关于  $P$  的研究，也正是心理学研究过去最关注的部分，因此，特质论与维度论在心理学理论上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消失，也一定会给心理学研究带来更丰硕的果实。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五篇与特质论与维度论特别有关的文章。其中，张建新与周明洁（2006）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燕国材与刘同辉（2005）的文章运用典籍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格因素，苏彦捷（2007）的文章解说了动物个体差异研究对人格心理学的贡献，张进（2007）的文章理清了性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彭凯平与 Nisbett（1999, 2000）的文章，则揭示了中国人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 思路之二：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

在前文的讨论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格心理学的社会认知论和文化心理学的动态建构论这两套学说的基本特征也非常相似。比如，它们在各自的学科分支当中有类似的学术传统，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积累的实证研究相对还不够丰富，研究方法较为多样。此外，它们本身的解释力应当更加强大。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个体或者文化跟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以及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个体内部或者文化内部的变异。显然，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最主要的差异，则在于社会认知论集中在个体水平上，而动态建构论集中在文化、国家，和社会的水平上。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使用  $P = f(S, B)$  这个公式来进一步抽象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两者的共通之处。如果说特质论与维度论都强调公式左边的  $P$ ，那么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则更强调公式的右边的  $f(S, B)$ ，即情境与行为的互动反应，只不过两套学说一个集中在个体水平上，另一个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这一类关于  $f(S, B)$  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在过去相对忽略了的部分。因此，虽然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尚未结出足够丰硕的果实，它们开创的可能性却无比广阔。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三篇与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特别有关的文章。其中，王登峰与崔红（2006）的文章分析了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及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赵志裕、康莹仪，以及 Dweck（1997）的文章是近年来性格内隐论研究的

发源，随后，赵志裕、区颖敏以及陈静（2007）的文章通过实例解说了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

### 思路之三：本土心理学

如果  $P = f(S, B)$  这个公式的左边已经有特质论与维度论的关于  $P$  的思路，右边已经有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关于  $f(S, B)$  的思路，那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别的思路了呢？

不是的，近二、三十年来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思路。虽然  $P = f(S, B)$  这个公式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简洁明了，但是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基于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与工具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并不一定适用。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文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验证从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心理学理论与工具在东方文化中的适用性。比如，一套理论在美国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心理学家会把该理论连同测量工具一起拿到中国来做验证。在有些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与工具确实可以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验证，从而获得更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但另一些时候，这些理论与工具可能根本就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验证以适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同时，扎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中的理论与工具相对而言也越发显得薄弱。虽然心理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源于欧洲，繁荣在美国，中国心理学家却有责任从头开始，发展出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真正适用的知识体系。

也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批中国心理学家特别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来自于西方的心理学进行深刻的反省，也开始将建设中国人的心理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趣。早在 1972 年，同性格与文化的研究特别有关，李亦园和杨国枢在他们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首先发出建设本土心理学的呼声。数十年来，以杨国枢、杨中芳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心理学家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自省，在制度建设上默默努力，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四篇有助于理解本土心理学思路的文章。其中，车文博（2003）的文章非常精炼地讨论了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及其整合的可能，黄希庭（2004）的文章反省了性格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杨国枢（2006）的文章回顾了关于性格的本土化研究的历史，杨中芳（2007）的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性格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无限可能。最后，本文以及《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系列，也可以看作对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一点贡献。

### 性格与文化未来的研究

到这里，我们已经回顾了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人格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我们之前的讨论都集中于对历史的宏观认识，讨论的层次也非常抽象，用意在于理顺性格与文化研究的背景和脉络。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其他例子，包括一些最新进展和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代表着性格与文化研究的未来方向，当然，它们也绝不是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未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只是种种可能性之一。



最近一、二十年来，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在心理学界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除了一些专门的学术书籍，还有《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和《Journal of Personality》等学术刊物分别在 1998、2000，和 2001 年出版了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特刊。我们也会注意到，以“大五”为代表的特质论尽管还有进一步修改的余地，但近年来日趋成熟，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一些人格心理学家已经使用由“大五”发展出来的问卷，测量了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上万人的性格，又根据人们在“大五”上的平均分数，勾勒出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性格轮廓，甚至基于“大五”平均分数的世界地图。这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工作最近连续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e.g., McCrae & Terracciano, 2005ab, 2006; Terracciano et al, 2005）。这些研究发现，同亚洲人和非洲人相比，欧洲人和美洲人在外向性上的得分较高，或者说，欧洲人和美洲人一般应当比亚洲人和非洲人更加外向，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人在“大五”量表上得分的差异，也应该与他们在基因上、历史、知识、和价值传统上的差异都有关联。

这一系列的最新研究又有什么问题呢？可能性至少有两个，一个与“参照群体”有关，而另一个与性格的“民间理论”有关，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影响足够显著，就算美国人在大五量表外向性上得分的平均值比中国人高很多，也不能说明美国人就比中国人更外向，反过来，就算中国人在外向性上得分的平均值比美国人高很多，也不能说明中国人就比美国人更外向，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系列性格与文化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和施测过程。从测量工具来看，基于大五的量表通常直接问研究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我认为自己是外向的”，或者“我在聚会的时候通常跟很多人说话”等不同陈述。从施测过程来看，测量工具先要翻译成不同文字，然后分别拿到不同文化中收集数据，最后再检验不同文化中的人在特定性格因素上的得分有何不同。我们将要考虑的“参照群体”和“民间理论”这两个问题都与大五的量表、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中施测时激活的特定心理过程有关，两者都有可能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分数和结论，我们首先来看参照群体的问题。

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是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Festinger, 1954; Hyman, 1942; Latane & Darley, 1970; Sherif, 1936），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当我们对自己做评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拿自己跟他人，或者说一个特定的参照群体做比较，当我们选择的参照群体有所变化，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也会随之变化。参照群体对跨文化研究的影响最早由彭凯平和他的同事们用实验的方法揭示（Heine, Lehman, Peng, & Greenholtz, 2002; Peng, Nisbett, & Wang, 1997），根据他们的观点，当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研究参与者参加同样一个跨文化研究时，虽然面临的具体研究要考察的维度相同，他们很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如果这两个参照群体在该维度上预先的平均值显著不同，那么研究参与者在这个维度上得分的含义就很有可能被扭曲，为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当人们评价自己（或者他人）性格的时候，很可能会使用某一个特定群体作为评价的依据。当我们说自己性格很外向的时候，其中默认的意思是我们比其他某些人更外向。其次，当人们选择参照群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关系也最密切的一个参照群体。不同文化中的人参加同样一个研究，一般只会选择自己文化中的他人作为参照群体，而不会选择其他文化中自己不熟悉的他人作为参照群体。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外向的时候，其中默认的含义是自己比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或者其他中国人更外向，参照群体是其他中国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比一个（居住在美国的）美国人更外向我们并不

知道，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参照群体。最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进行测量之前我们就可以假定他们各自已经有了一个外向性的平均值，假设中国人其实非常外向（因此在外向性上假设的平均值很高），而美国人其实非常内向（因此在外向性上假设的平均值很低），在参加测量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研究参与者就可能会因为周围的中国人都非常外向而降低自己在外向性上的打分，来自美国的研究参与者则可能因为周围的美国人都非常内向而提高自己在外向性上的打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简单使用“大五”量表来测量和比较不同文化中人的性格差异可能非常不可靠，不一定能反映人们在性格上的真正差异。

另一个可能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分数和结论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性格的民间理论（lay theories），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大多数人是如何具体定义某一个性格特质的。在一个文化内部，对某一个性格特质的具体定义应当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并且被文化内部的人广泛接受，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外向性是指一个人喜欢说话，容易与陌生人沟通，以及喜欢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等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发展出对同样一个特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定义，从而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结果，为什么呢？我们对照参照群体的原理来看。

首先，当人们评价自己（或他人）性格的时候，可能会直接使用某种民间理论对性格的具体定义。参照群体的观点认为人们会拿自己跟一个特定参照群体在某一个特质或者维度上作对比，而民间理论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会拿自己的具体行为跟该特质的民间理论相匹配。比如，“喜欢说话”这样的行为，被大多数中国人定义为外向性很高的行为，这时，我们并不一定要依赖于某一个参照群体，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很喜欢说话，就可以直接认定自己非常外向了。其次，同参照群体的原理相似，当人们评价自己性格的时候，更有可能只会选择自己文化里的民间理论，而不太可能选择其他文化的民间理论。最后，当一个特质在不同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民间理论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来自于这些文化的研究参与者在某特质上的得分差异就很难解释。比如，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的行为可能是中国人外向性定义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美国人外向性定义的一部分，就算这个行为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定义为外向性的行为，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个行为非常外向，而美国人可能认为这个行为仅仅是一般外向而已。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简单使用大五量表来测量和比较不同文化中人的性格差异可能非常不可靠，不一定能反映人们在性格上的真正差异。

“参照群体”与“民间理论”这两个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大五量表在不同文化中施测时激活的特定心理过程，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很的解决，它们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还不清楚。更有意义的是，这两个问题显然不局限在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它们在其他跨文化研究当中也可能发生作用。因此，对这两个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突破，可能会是性格与文化、以及其他跨文化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结合前面谈到的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我们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会不会每一种思路都能提供自己的方案呢？会不会三种思路的综合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留给我们的读者来思考吧。

## 参考文献

- Allport, G. W. & Odbert, H. S. (1936). Trait 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47, 211.
- Ashton, M.C., Lee, K., Perugini, M., Szarota, P., De Vries, R.E., Di Blas, L., Boies, K., & De Raad, B. (2004). A six-factor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descriptive adjectives: Solutions from psycholexical studies in seven langua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356-366.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26.
- Benedict, R.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Cantor, N. (1990). From thought to behavior: "Having" and "doing"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735-750.
- Cattell, R. B., Eber, H. W., & Tatsuoka, M. M. (1970). *Handbook for the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16PF)*. Champaign, IL: IPAT.
- Ceci, S., & Williams, W. M. (Eds.). (1999). *The nature-nurture debate: The essential readings*. Malden, MA: Blackwell.
- Cervone, D., & Shoda, Y. (Eds.). (1999). *The coherence of personality: Social-cognitive bases of consistency, variability, and organization*. New York: Guilford.
- Chick, G. (1997). Cultural complexity: the concept and its measurement.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1, 275-307.
- Chiu, C-y., Hong, Y-y., & Dweck, C. S. (1997). Lay dispositionism and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9-30.
- Davis-Blake, A., & Pfeffer, J. (1989). Just a mirage: The search for dispositional effec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385-400.
- Digman, J. M. (1990). Personality structure: Emergence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1, 417-440.
- Dweck, C. S. (1996). Captur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0, 348-362.
- Fei, X.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 117-140.
- Funder, D. C. (1999). *Personality judgment: A realistic approach to person percep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Funder, D. C. (2001).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97-221.
- Funder, D. C. (2006). Towards a resolution of the personality triad: Persons, situation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 21-34.
- Funder, D. C., & Colvin, C. R. (1991). Explorations in behavioral consistency: Properties of persons, situation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773-794.
- Funder, D. C., & Ozer, D. J. (1983). Behavior as a function of the sit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07-112.
- Galton, E. (1884). Measurement of character. *Fortnightly Review*, 36, 179-185.

- Goldberg, L. R. (1981). Languag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search for universals in personality lexicons. In L. Wheeler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pp. 141-165). Beverly Hills, CA: Sage.
- Goldberg, L. R. (1993). The structure of phenotypic personality traits. *American Psychologists*, 48, 26-34.
- Gorer, G., & Rickman, J. (1949).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 Heine, S. J., Lehman, D. R., Peng, K., & Greenholtz, J. (2002). What's wrong wit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subjective Likert scales? The reference-group e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903-918.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ng, Y., Morris, M. W., Chiu, C., & Benet-Martínez, V. (2000). Multicultural minds: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709-720.
- House, R. J., Shane, S. A., & Herold, D. M. (1996). Rumors of the death of dispositional research are vastly exaggerat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203-224.
- Hsu, F. L. K. (1953). *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H. Schuman.
- Hsu, F. L. K. (1963). *Clan, caste, and club*.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Hyman, H. (1942). The psychology of subjective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9, 473-474.
- Inglehart, R. & Norris, P.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 O. P. (1990). The "Big Five" factor taxonomy: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 In L. A. Pervin (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66-100). New York: Guilford.
- John, O. P., & Srivastava, S. (1999). The Big-Five trait taxonom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 pp. 102-138). New York: Guilford.
- Kenrick, D. T., & Funder, D. C. (1988). Profiting from controversy: Lessons from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3, 23-34.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tane, B. & Darley, J. M. (1970).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Leung, K. & Bond, M. H. (2004). Social axioms: A model for social beliefs i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 119-197.
- LeVine, R. A. (2001).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1918-1960: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 803-818.
- Lewin, K.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 Lin, Y. (1935).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 Markus, H.,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atsumoto, D. (1999). Culture and self: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Markus and Kitayama's theory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 289-310.
- McCrae, R. R., & Costa, P. T. (1985). Updating Norman's adequate taxonom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dimension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710-721.
- McCrae, R. R., & Costa, P. T. (1999). A five-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L. A. Pervin & O.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139-154). New York, NY: Guilford.
- McCrae, R. R., & Terracciano, A. (2005a). Personality profiles of cultures: Aggregate personality trai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407-425.
- McCrae, R. R. & Terracciano, A. (2005b). Universal features of personality traits from the observer's perspective: Data from 50 cult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547-561.
- McCrae, R. R. & Terracciano, A. (2006).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156-161.
- Mischel, W.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Mischel, W. (2004). Toward an integrative science of the pers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1-22.
- Mischel, W., &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246-268.
- Mischel, W., & Shoda, Y. (1998). Reconciling processing dynamics and personality disposi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 229-258.
- Mischel, W., Shoda, Y., & Mendoza-Denton, R. (2002). Situation-behavior profiles as a locus of consistency in personal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50-54.
- Moffitt, T. E., Caspi, A., & Rutter, M. (2005). Strategy for investiga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measured genes and measured environment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 473-481.
-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 Ozer, D., & Benet-Martínez, V. (2006). Personal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nsequential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7, 401-421.
- Pelto, P. J. (196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societies. *Transaction*, April, 37-40.
- Peng, K., & Nisbett, R. E. (1999).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741-754.
- Peng, K., & Nisbett, R. E. (2000). Dialectical responses to questions about dialectical think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067-1068.
- Peng, K., Nisbett, R. E. & Wang, N. Y. C. (1997). Validity problems comparing values across cultur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 329-344.

- Read, S. J., & Miller, L. C. (1989). Inter-personalism: Toward a goal-based theory of persons in relationships. In L. A. Pervin (Ed.), *Goal concept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p. 413-47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oberts, B. W., & Pomerantz, E. M. (2004). On traits, situations, and their integr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8, 402-416.
- Ross, L., & Nisbett, R. E. (1991). *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 Schimmack, U., Oishi, S., & Diener, E. (2005).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 valid and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9, 17-31.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6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wartz, S. H. (1994). Beyond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New cultural dimensions of values. In U. Kim, H. C. Triandis, C. Kagitcibasi, S. Choi, &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pp. 85-11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warz, N. (2000). Social judgment and attitudes: Warmer, more social, and less consciou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149-176.
- Sherif, M. A. (1936).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 New York: Harper.
- Shoda, Y., & Mischel, W. (1993). Cognitive social approach to dispositional inferences: What if the perceiver is a cognitive-social theoris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574-585.
- Shoda, Y., & Mischel, W. (1998). Personality as a stable cognitive-affective activ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 patterns of behavior variation emerge from a stable personality structure. In S. J. Read, L. C. Miller (Eds.), *Connectionist models of social reasoning and social behavior* (pp. 175-20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wann, W. B. Jr. & Seyle, C. (2005). Personality psychology's comeback and its emerging symbiosis with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55-165.
- Takano, Y. & Osaka, E. (1999). An unsupported common view: Comparing Japan and the U.S. on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 311-341.
- Terracciano, et al. (2005). National character does not reflect mean personality trait levels in 49 cultures. *Science*, 310, 96-100.
- Triandis, H. C. (1994).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Vroom, V. H., & Jago, A. G. (2007). The role of the situation in leadership.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17-24.
- Wang, D., Cui, H., & Zhou, F. (2005). Measuring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QZPS versus NEO PI-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 97-122.
- Yang, K-S. (2006). Indigenous personality research: The Chinese case. In Kim, U., Yang, K., & Hwang, K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285-314). New York: Springer.

- 车文博（2003）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的整合：当代西方心理学理论范式发展的走向.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5), 1-6.
- 费孝通（1948）*乡土中国*. 香港: 凤凰.
- 黄希庭（2004）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30(6), 5-9.
- 李亦园, 杨国枢（1972）*中国人的性格*. 台北: 桂冠.
- 苏彦捷（2007）动物个体差异研究对人格心理学的贡献. *心理科学进展*, 15(2), 260-266.
- 王登峰, 崔红（2006）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及人格与行为的关系--对人格内涵及其中西方差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心理学报*, 38(4), 543-552.
- 燕国材, 刘同辉（2005）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因素人格理论. *心理科学*, 28(4), 780-783.
- 杨宇（2008）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性格与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中芳（2008）研究中国人性格的一个本土架构.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性格与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建新, 周明洁（2006）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心理科学进展*, 14(4), 574-585.
- 张进（2008）幸福的人格存在吗？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综述和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性格与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2008）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共享内隐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性格与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